

三地抗甲流港應作表率

□范冰



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連接世界的窗口，面對甲流如何預防和部署的問題，應在粵澳之爭中起表率作用，才能令對外聯繫和影響力更強。因此，首先要做好兩批合共三百萬劑預防甲流疫苗的接種工作，然後令市民普遍提高對第二波甲流高峰可能到來有心理準備，雙管齊下，效益更強。

甲型H1N1流感會不會重臨香港，影響會多大，在冬季這個流感季節，做好防疫措施必須放在首重位置。政府決定分兩次輸入五十萬及二百五十萬劑流感預防疫苗為市民接種，被視為第一步提高市民抗擊流感的措施。但還有重要的第二步的考慮與周邊地區建立更緊密預防合作關係，聯手合作抗疫，才能收到更顯著效果。最近在珠海舉行的粵港澳傳染病防治聯席會議，目的就是為了加強三地聯防，作用突出，意義重大。

追根溯源預防為重

首先，出入邊境填報制度需要繼續執行，它對於掌握發病個案有顯著的作用，如果發現甲流患者曾經出入邊境，便能夠及時堵截源頭，對於防止病毒擴散有追根溯源的作用。目前對甲流的危險性市民尚未能引起像沙士疫潮時的高度重視，因而出現未能認真填報資料的情況，有市民填報的資料極為簡單，對追根溯源最有作用的地址及聯絡電話號碼也常欠慎漏墳，存在着馬虎應付的心態。在三地政府衛生官員都強調甲流有可能在未來兩三個月出擊衝波的時候，加強對疫情的掌控，監督填報工作是一項不可輕視的行為。

其次，要明白粵港澳三地人流互動的頻密性，可能成為散播甲流的最大載體，任何一個邊境管制站出現甲流病患者，影響的都可能是三地爆發大規模甲流的禍端，能否管理好每一個邊境管制站，對控制甲流爆發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論是羅湖這個全球人流最大的邊境管制站，還是港澳碼頭二十四小時通關運作，都是甲流傳播的高危之地，不掉以輕心才能保障把甲流病毒控制在預防範圍內。

實際情況影響普選決定

對於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雙普選時間表的決定（即2017年第5任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在此之後全部議員可由普選產生），普遍受到香港市民的歡迎，但對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不由普選產生的決定，香港社會卻未必完全理解。

香港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強調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實現雙普選的目標，不少人以為有了完備法律、法治社會、教育普及、廉潔政府、溫和的中產階層、通訊先進、經濟發達等實際情況，就可以實現普選了。上述種種因素其實並不必然決定可否普選，法德美等歐洲國家在戰後貧困時期、中印等亞洲國家在經濟不發達時就實現了普選；美國1965年取消選民的文字測驗而實現普選，目的是讓沒有受到教育的人也可以投票。可見經濟發達與否、教育水平高低並非普選的必要條件，上述其他因素也可以論證都不是普選的必要條件。

「國家認同」不能偏低

所謂普選的必要條件是指決定普選成敗的條件。如果具備該條件，普選就可能成功；如果不具備該條件，普選就可能失敗。人類實現普選的歷史只不過60多年，各國、各地既有普選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其成敗優劣，取決於執政者對當時實際情況的判斷。

什麼是足以影響香港普選的實際情況呢？筆者認為，至少有三種實際情況影響並決定普選能否成功，是決定實行普選不能忽略的因素和條件。

一是國家認同。國家認同是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和報效感。美國曾經長期歧視黑人和印第安人，各州黑人奴隸只按3/5計算人口，未課稅的印第安人還不算人口。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解放黑奴，激發黑人的國家認同，不久普及了男性黑人的選舉權。再過百餘年，連沒有文化的國民也有國家認同了，才終於實現普選。台灣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認同還是很強烈的。1993年李登輝別有用心推動入聯、「修憲」，才引發認同混亂，省籍衝突，族群撕裂，但都在1996年普選「總統」，導致2000年「台獨」政黨執政。直到2008年才矯枉撥亂。上述例子提供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香港回歸祖國後，特別在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倡國民教育後，青少年的國家認同迅速加強，但一般人依然不強。據中大亞太所民調顯示，2009年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和中國的香港人有57%，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有43%，而認同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卻只有13.3%。比率雖比回歸時高，但仍偏低。

貧富差距不能擴大

二是政治生態。按比例代表制的設計，香港特區應當有多重陣營出現才對，但卻形成建制派和反對派兩大陣營對壘，歷屆立法會分區直選呈現所謂「六四律」，建制派大約獲得40%的選票，反對派大約獲得60%的選票，投票率越高，對反對派越有利。這種情況，不利普選。例如泰國篤信佛教，民性平和；但在普選之後，城鄉對立日益嚴重，紅衫軍、黃衫軍不斷爆發衝突，政府頻繁更替，國無寧日，甚至觸發外交風波。美國雖然實行兩黨制，但民主、共和兩黨在最重要的政綱和理念上並不截然對立，兩黨選民也不都必然投哪一個政黨候選人的票。這也提供了正反事例。香港的政治生態如得不到根本改善，恐步泰國後塵，難效美國之法。

三是貧富差距。雖然香港沒有絕對貧困問題，但卻存在大量的相對貧困、在職貧困等問題，貧富差距還在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是香港的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最近，聯合國開發計劃公布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顯示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中，香港衡量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是最高的，排名第一。如把香港放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中，香港也排在十數名最差的行列中。在這種狀況下實現普選，香港就會像印度和一些非洲國家一樣。法德英在戰後貧富不懸殊的條件下普選，才走上民主成功之路。香港貧富懸殊如不改善，將走向民粹主義。

面對國家認同率偏低、政治生態欠佳、貧富懸殊惡劣的實際情況，任何有普選決定權的中央國家機構和國家領導人，都不可能決定香港的普選。誰決定香港的普選，誰就可能成為「一國兩制」的罪人。現在距離普選時間還有若干年，香港特區政府和市民要共同努力，爭取在普選前的適當時機，影響香港普選的三大因素能有較大的改觀。

作者為法學博士



說來有點令人驚奇，

，也有點不可思議：香港近期忽然多了不少懷念董建華的人。就算在輿論界，多份報章的多位評論員都在文章中提及董建華，且一概都是

只寫到他的好處及他的優點。最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評論員，當年曾經是「倒董」的激烈人物，想不到如今卻會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另有一件事也使人覺得好生奇怪：時至今日，有些人談到樓市、房屋、樓價時，常常會提到「八萬五」，並且有意無意或有心無心將之列為董建華管治香港時期的一條「罪狀」，甚至是一項「大罪」。這些人將樓價下跌、出現逾十萬宗負資產，以至因亞洲金融風暴導致香港經濟一度陷入谷底等情形，一股腦兒算在「八萬五」和董建華的賬上。這樣的判斷，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但今時今日冷靜回顧及根據資料分析，還能只怪罪「八萬五」和董建華嗎？將某些不如意事歸咎於某一個人（例如行政長官），並且對之批評指責，那是容易的事，在香港也有這樣的自由。但是，監督政府，批評政府，一切都是要以事實作為根據，並且要以理服人。

各行各業 有升有跌

如果把「八萬五」說成是樓市崩塌、經濟低迷及出現負資產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又將時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形容為「罪魁禍首」及「樓市災難製造者」，相信不但董建華心中不服，許多事實求是、立心公道的市民，對一切歸罪於董建華也是不服的。將「八萬五」和董建華看成是「罪狀」和「罪人」，可以比之為「四夫無罪，懷璧其罪」（典出《左傳·桓公十年》）。「八萬五」者，實乃無價之「璧」

也。有些人不識貨，視寶玉為碎石，更視之不祥之邪物，以至於恨之入骨，唯恐其捲土重來，破壞某些人靠地產或炒樓發達的夢美。「懷璧其罪」，「罪」在此也。

這裡，應對「負資產」問題解說幾句。其一，世上各行各業都有升有跌，地產或樓價也不能例外。其二，世上不可能有永遠上升的樓價，炒樓成功或失敗，與炒股賺錢或虧本，道理是完全一樣的。其三，由於長期以來政策偏幫地產業，炒樓或投資物業的失敗者可以更大聲地埋怨、甚至咒罵政府或政府領導人。其四，樓價升跌：對市民特別是業主當然有心理影響；升，賺錢（至少賬面賺錢，及時沽出即實際賺錢）；高興；跌，虧本，悲傷。不開心，甚至暴跳如雷。這是資本社會的平常事也。其五，對於只有一個單位供自住的業主而言，除了或喜或悲的心理影響，管它是正資產或負資產，管它值十萬元、一百萬或一個億、十個億，都沒有可供買賣的意義。關鍵在於，這個單位是否已還清按揭貸款？或者，相關業主是否仍擁有繼續供樓的能力？假如供樓能力照舊，則是否負資產就可以不用着緊了。當年逾十萬宗負資產，大部分是自住物業，又其中絕大部分的業主仍能保持供樓能力，所以，除了心情不爽、怨氣沖天之外，並未連累銀行體系，更未造成社會動亂。當年的樓市雖狂瀉不止，但基本上仍可算是「軟着陸」。如今還有人將「八萬五」和董建華看成是「罪大惡極」，那是沒有道理、不負責任或別有用心的言論。

持續發展 並未做錯

「八萬五」從行政程序上說，應是一項集體的決策，董建華只是起了主導和拍板的作用。此點姑且勿論。「八萬五」實際上也是歷史的延伸和政策的延續。當年，香港是和平回歸，而且，在「五十年不變」之下，不必樣樣都推倒重來。該改變的無疑一定要改

馬時亨為「現實」苦惱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近日重返商界，出任中策集團主席，在社會上引起爭議。他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重新申工作不存在利益衝突，又認為現時社會上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指控氾濫，窒礙社會發展。

馬時亨再戰商場的消息一出，惹起外界很大回響。馬時亨對此表示，「諺吃早晚都諺唔到點樣有利益衝突」，他強調中策雖為香港上市公司，但資產在台灣，與特區政府沒有交往，可謂馬牛不相及。

馬時亨的苦惱，其實反映了香港官員退休或離任後，投身商界存在灰色地帶和巨大爭議。有些外國政府完全禁止內閣部長或高級公職人員，離職後從事與本人曾負責的政策範疇有關的私人公司甚至公營機構職務。特區政府對離職公務員轉職監管，亦有嚴厲處罰，但對問責官員、常任秘書長等，除了延長「過冷河」期外，對該些官員從事與原有政策範疇有關的私人職務，卻沒有嚴格的禁止。

再戰商場惹爭議

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官在退休後，要開展個人事業「搵真銀」，從來都不愁出路。這是由於他們大部分在官場擁有多方面的經驗及強大的人脈關係，而且廣為市民認識，因而在退休或離任後，成為各大私營機構爭相羅致的對象。現時社會上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指控氾濫，與此有一定關係。

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轉投私人機構任高職引來社會關注，梁展文任職高官其間，被指會以8.64億元補地價，把紅灣半島（現改稱海濱南岸）賤賣給地產商，而被社會非議。因此他轉投私人機構被指利益輸送。梁展文事件前，前副房屋署署長鍾麗嫻退休後投身地產商，結果她會受到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書面告誡。

梁展文事件發生後，社會認為政府應加強對離職公務員轉職私人機構的規限，例如對某些職級人員延長「過冷河」時間，甚至禁止他們離職後再從事私人公司職務。不過，有些人認為如吸緊離職高級公務員轉職限制，會不公平。馬時亨感慨說：「如果早知今日有這麼多麻煩，我當時可能未必加入政府。」這說明任何人一旦加入政府任高官，離職後再戰商場，不可避免會引起爭議。馬時亨的苦惱，其實反映了香港社會的這一現實。現時社會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指控，由離職高級公務員轉職限制，倒是宥礙社會發展之虞。



加強本地魅力

□丁金



香港每年的遊客約有二千九百萬人次，而參觀遊覽迪士尼樂園的內地遊客約是一百六十萬人次，比例上只佔百分之五點五，不算很多。這個數字再次說明，來香港的遊客，其目的主要還不是因為香港有個迪士尼，而是：一，消費購物；二，美食；三，景點。最後才是遊玩迪士尼和其他方面的目的。

由此可見，不必過擔心上海建了迪士尼就會大大搶去來香港的遊客。來香港遊覽迪士尼的遊客有一半是來自華東華北，要說影響看來就是這一批吧，數目不算太大。

世界上任何行業都有競爭。像迪士尼主題公園這樣熱門的娛樂設施，搞了很多不同地方的版本，但也只是某些方面有差異，就大的方面來說，卻是萬變不離其宗。一旦多了起來，成了「共同財富」，但肯定也就少了創意。香港的迪園比較小，香港的優勢並不在這個主題公園，因此上海建了迪園之後，並不是說所有遊客都會一股腦湧向那兒，令香港迪園冷清；我們當然無法估計專去上海迪園的遊客有多少，但可以肯定，來港旅遊的大小遊客，依然會順便遊迪士尼。怕什麼呢？何況，香港迪園仍打算擴建。這擴建中，可以弄一些將來上海迪園所沒有的東西，令其具備獨創性；其次，迪園在門票方面，在長遠的考量之下，可以將價錢下調，令競爭力更強；其三，在服務、各種優惠方面依然可以設計一些花樣，令其更吸引遊客。

在努力改善之外，如果實在不敵他人，也完全不必灰心失望，可在其他方面加強優勢。恢復一些大牌檔，多建富香港特色的食街，打造新的香港夜市、建立明星館……組織一批旅遊業智囊團精英出謀劃策，必有許多良計妙策獻出來，令香港更有魅力！



·黃牛·

「八萬五」不是罪應平反

□李幼岐

變，但像房屋政策這樣的事，注意及重視其可持續發展，並未做錯，怎會有「罪」？同文積德已指出「八萬五」政策實際是於彭定康任內部署及制定，「由彭定康主持拍板」。此事還可以追溯得更久遠一些。一九七三年，香港制定「十年建屋計劃」，目標有三：第一，每個家庭均擁有自己的居住單位；第二，全部單位都應是水、電、廁、廚等設施齊備的獨立式單位；第三，每個家庭成員的居住面積不少於三點二五平方米（約三十六平方米）。這當然只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最低標準。香港政府為實現此計劃，還成立了「房屋委員會」。一九八八年，香港政府又提出了「長遠房屋策略」，包括實施新的公共房屋政策，房委會改組，成為兼有與發展商合作建屋的協調職能的公營機構。

以民為本 值得懷念

就事論事，「八萬五」實質上是「十年建屋計劃」和「長遠房屋策略」的進一步發展。試問，「八萬五」有什麼不對？又有什麼不好？只可惜「八萬五」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生不逢時，不能不令人扼腕嗟嘆。

從另一角度說，不解決「住」的問題，不能做到「住者有其屋」，恐怕算不上「以民為本」。站在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羅大眾的立場，反而「八萬五」倒是符合「以民為本」施政理念的房屋政策。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詩中吟唱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在今天看來，這一樸素和真誠的訴求，仍然具有崇高的社會意義，唐代的大詩人表達了當代普羅大眾的心聲。從這個意義上說，董建華和由他代表特區政府提出的「八萬五」建屋政策，值得稱頌，值得懷念。但願他日沒有「八萬五」，也會有「七萬五」或「六萬五」！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